

## 绪 言

本书为《河北通史》宋辽金元卷，所记述和研究的是辽、宋、金、元时期河北地方的历史。

宋辽金元四朝在河北的统治延续四百年有余，从 960 年北宋建国起，到 1368 年元朝灭亡止。这一时期的河北史处于全国由分裂又一次实现统一的历史阶段中，时代的特征和地方特色都十分鲜明。

自唐末，军阀政权争雄，王朝屡易，后周时在河北才出现了统一和稳定的趋势。960 年，赵匡胤废后周自立，建国北宋，与契丹族政权——辽国对峙。1004 年，宋辽“澶渊之盟”规定以白沟河为界，从此双方和平相处百余年。938 年时，辽国始以燕京（今北京市）作陪都，时称南京。1042 年时，北宋以大名府（治今大名县东北）为北京，两个都城同处河北一地，标志着河北具有举足轻重、动关大局的历史地位。

唐宋时代，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北宋以及后来的南宋，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居于世界最前列，不愧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河北是北宋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广大平原地带垄亩开辟、平畴绿野。王安石变法时期，

水利大兴，淤田面积扩大，土壤改良成绩显著，在深、冀、沧、瀛诸州之间尽多“美田”，种麦所获是他田十倍。河北还是北宋的钢铁生产基地之一，邢州、磁州的矿冶产量位居于前茅，磁州锻坊采用先进方法，生产大批优质“真钢”；“珍于天下”的定瓷胎薄如蛋壳、击之如钟声；有“雕镂之象”的定州刻丝花色绝妙、美丽逼真，这些都是河北手工业发达的代表产品。由于河北纺织业优质高产，史称河北“衣被天下”，河北东路有“绛绢州”之称。与北宋依河为界的辽国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吸取中原先进文化，维护了以南京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保持了封建秩序，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宋辽边境的榷场互市也出现了“商旅辐辏”的贸易盛况，两朝互通有无，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古今对“澶渊之盟”褒贬不一，从河北地区看，盟约有益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对避免战争、维护和平起到保障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除双方经济发展之外，正定的隆兴寺大佛、定州的料敌塔、以水景花木取胜的潭园、苏轼的雪浪石、“大内壮丽”的南京城、蓟州的独乐寺等，都是当时文化繁荣的见证。一代名垂史册的封建政治家、军事家如萧太后、耶律休哥、杨延昭、寇准、包拯、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宗泽等历史人物都曾活跃在燕赵大地上，他们对河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

1115年，肇兴东北的女真族建立了新王朝——金朝。其后，以其精兵健马平辽灭宋，占据中国半壁河山，并于1153年迁都于燕，时称中都。这座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其布局建筑仿宋汴京的规划。它与辽南京城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都已不是陪都，而是金朝的首都，国家的政治中心。从此，幽燕地区成为“畿甸”之区，河北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以

后到元、明、清三朝，河北一直是畿辅重地，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女真族原本处于奴隶制阶段，自进入中原后，长期吸取汉族先进文化，到金章宗时终于完成了封建化过程，经济上取得了重大进步和发展。金代文学家蔡松年的诗句“春风北卷燕赵，无处不桑麻”，就是当时河北农业经济发展的生动写照。北宋时著名的定窑、磁州窑以及沿海的采盐业，定州、大名的丝织业，在金代继续进行生产，有的技术还有创新，如制作定瓷的“砂圈叠烧法”，使瓷器产量进一步提高，产品更加大众化。进入金朝，河北地区实现一统，再无尔疆彼界之分。随着商业交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有些市镇也日益繁荣，如新仓镇“人烟繁富”，大定十一年（1171年）升为县，名宝坻县。科学文化的发展，以河北名医刘完素的医学和雄伟壮丽的卢沟桥为突出代表。金大定年间铸造的大铁钟、铁狮子也同样具有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金代戏曲继北宋之后又有发展，逐渐形成北方派杂剧，对元杂剧有着直接的影响。

元朝实现全国大一统。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后，频频南下，金宣宗被迫南迁于汴（今河南省开封市），蒙金势力更迭，到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时，河北之地尽归新主。蒙古族以及先前的女真族在入室中原之际，都曾使河北的经济、文化遭到过严重的破坏，许多地方农桑废业、户口陡减，在局部地区出现过倒退现象。然而，古籍旧书往往极力夸张渲染，所谓“惟务杀戮生灵”、“凡所经过，尽皆焚燹”的说法都失之偏颇，不够科学和公正，应予具体地分析对待，杀掠有节和恢复发展地方经济的一面也不可忽视。因此，本书在记述金、元河北经济史时，则侧重于所取得的成就，以示补偏。

蒙古族本为游牧民族，南下立国之后，农业逐渐成为其立国之本，到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号“大元”，并定都于

燕，次年改称大都（今北京市）。从此，大都就成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其都市的规模和建设在古代世界范围内是空前的。1270年，元朝设置大司农司，专门管理农业生产，与全国一样，河北的农业在元世祖统治时期又有了新的恢复和发展，尤以水利建设最为显著。中国享誉世界的八位古代科学家之一郭守敬，河北邢台人，精通天文、水利之学。他的六项水利兴修计划得到元世祖的支持，其中有三项直接关系到河北地区的农田水利开发。河北有大规模的屯田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又一表现，推行军屯、民屯使大量荒地、牧地变成良田。在手工业生产中，河北的铁冶、制盐获较大发展，仅顺德府（治今邢台市）綦阳镇岁办铁75万斤，冶户2764户。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辖盐场22处，其中以越支盐场最大。这个盐场课居其半，盐课以盈，席袋山积，瓦庐相连，牛马蔽野，灶户不断增加，产量提高很快。丝织业仍有普遍的生产，缀有珍珠的丝织品“纳失失”证明了生产技术的高超。

由于元大都的设置，河北的水陆交通也更为发达。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六条辐射全国的大道纵横贯穿河北，延伸四面八方，对沿路的商业发展、城镇的繁荣有着促进作用。真定（今正定县）是陆上交通要冲之地，居民商贾甚多，城内繁华连薨接栋，井肆繁夥。大都更是一座国际性大城市，国内外商人都云集于此，欧洲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道：“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里找到。”元时河北的科技、文化也有举世闻名的重大成果，如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关汉卿的元杂剧《窦娥冤》等，其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赞誉。他们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河北地区的历史上，辽宋金元时期也是汉民族与北方少

数民族相互交融、渗透的重要时期。燕山南北具有兼采华夏与夷狄之长的历史地理优势，长城内外的两地文化虽有先进、落后之分，但各有所长，两者的融合也给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生命力。自辽以来，北方“引弓之国”南下中原，几经干戈，但古老的中原文化并未消亡，而是与之相融合而光大更新；同时，北方少数民族也吸取了中原先进文化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辽金元各王朝在长期的融合中，都逐步接受了儒学，以儒学为正统思想，各族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也深受汉族的影响。例如女真族的文字就是参照汉字创造的，金代戏剧也是植根于汉族文化土壤中的艺术之花，到元时，迁入中原的女真人已被视为汉人。元朝重用汉人习汉法，大都城的建筑兼采汉、蒙及维、藏的技术和风格，成为民族大融合的象征。

辽宋金元时代，为了反抗封建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压迫，河北人民亦曾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辽朝的董才起义、北宋的王则起义、宋江起义、五马山寨和太行军民的抗金斗争、金朝的红袄军起义、元朝的红巾军起义等都具有代表性，他们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是全国人民反封建、反民族压迫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 第一章 宋辽弭兵敦好划定白沟为界

### 第一节 宋初河北的边务与经济

公元 960 年，后周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归德节度使赵匡胤废周建宋，是为宋太祖，改元建隆，史称“北宋”。赵匡胤取代后周，遂遣使遍告郡国藩镇，分别加官晋爵。原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曾握重兵屯真定，韩令坤领兵巡防北边，宋立国后两人皆听命，加延钊为殿前都点检，令坤为侍卫都指挥使，河北始定。

#### 一、以备御为主的对辽政策

定幽燕之策 公元 936 年，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与辽，构成了后来宋辽矛盾冲突的根源。宋建国后，宋河北路与辽国隔白沟河相望，双方虎视眈眈。辽对新建的邻邦不时派兵骚扰，以试探虚实。辽应历十年、宋建隆元年（960 年）三月，辽兵入侵，河北棣州（治今山东省惠民县），宋刺史何继筠居边 20 年，知敌情屡以少胜多，这次又“追破其众于固安（今固安县），获马四百匹”<sup>①</sup>。辽兵数侵边，促使赵匡胤尽快制定对辽国的方针

<sup>①</sup>《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 《建隆元年三月》。

政策。北宋建国时，南方还存在着南唐、后蜀、楚、闽、南平等几个割据政权。同时，黄河以北有北汉和辽国，而辽国又是其中最强大的。宋太祖赵匡胤参酌枢密使赵普的意见，确定了向南开拓发展，向北暂取防御的政策，也就是先南后北的方针，即先消灭南方诸国，后夺取辽属幽燕地区。

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赵匡胤在进行削平南方诸国战争的同时，对北方积极调整部署，命将分部守边，由李汉超屯关南（今雄县一带），马仁瑀守瀛州（治今河间市），韩令坤镇常山（今正定县），贺惟忠守易州（治今易县），何继筠领棣州，令各保关隘、养锐待敌以拒辽。乾德四年正月，雄、霸、瀛、莫等州宋兵校猎于幽州境上，对辽以耀威武。宋开宝二年（969年），令镇、深、赵、邢、洺五州管内镇寨县筑城，加强设防。为确保边关，对带兵诸将，宋太祖都给予优渥待遇，对本人及家属抚之甚厚，如郡中管榷之利可任其支用，恣其贸易而免过税；凡军中事允许自便处理；每来朝宋太祖必召对，授以谋略：“来则掩杀，去则勿追”，并赐以饮食、珍奇珠宝。还令诸将招募勇士使为间谍，以便洞知敌情。这些措施使边将皆富于财、专于边备，十余年不易其位，辽兵每入边，必能先预知为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贺惟忠守易州，所向无敌，名震契丹，十余年不敢侵边，民皆信赖。李汉超镇关南，曾因强娶民妇、贷钱不偿被民告发。当时，宋太祖曾问讼者：“汉超未至关南时，契丹何如？”讼者曰：“岁苦侵暴。”宋太祖又问：“今复尔邪？”讼者曰：“无也。”可见，关南安定是人民所公认。讼案经宋太祖圆满处理，“汉超感泣，由是益修边政”，而“契丹不敢视关南尺寸之地”<sup>①</sup>。因西北边防获得保障，十余年中，辽不敢犯塞，

《宋史纪事本末》卷2《收兵权》、《宋史》卷303《陈贯传》。

这不仅使河北免受岁遭劫掠之患，同时对宋尽力东南，夺取荆湖、川广、吴楚之地也是有力地支持。

边事初宁 宋太祖收拾五代十国残局决非易事，其中，宋最有力的对手既不是南方列国，也不是北汉、西夏，而是强辽。赵匡胤曾说，“今之劲敌正在契丹”<sup>①</sup>，欲攻燕败辽须慎之又慎，不可轻举妄动。他推服后晋宰相桑维翰的主张，即与契丹失欢，所损者大而所利者小。而且，一旦兵戈既起，将帅擅权，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结果终将造成尾大之祸。基于这样的分析认识，宋太祖尽收南方诸国府藏，将金帛宝货席卷而归，目的是“欲候满三五百万，即与契丹以赎幽、燕故土”<sup>②</sup>。宋太祖的赎取政策也算明智，符合宋初实际综合国力，而且避开战祸，于经济恢复、稳固统治有利而无害，修好免战自然也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此时，辽国自辽太宗占据中原得而复失之后，正处于中衰转向中兴的阶段，一时无力再下中原与宋争雄。宋辽双方当时均无以武力吞并对方的战略方针，所以在宋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974年）双方互致书信，表示修好。据有关史书记载：“宋遣使请和（辽）以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加侍中与宋议和”<sup>③</sup>。宋太祖“遂命知雄州孙全兴答涿州修好书”<sup>④</sup>。辽朝耶律昌珠致宋书云：“切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常不世载欢盟，时通贖币。往者，晋氏后主政出多门，惑彼强臣，忘我大义，干戈以之日用，生灵于是罹灾。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

《宋稗类钞》卷 1 《君范》。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 3。

《辽史纪事本末》卷 19 《宋初和战》。

《宋史》卷 3 《太祖三》。

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sup>①</sup>，欢盟之意溢于言表。宋太祖在百官称贺契丹通好时也说：“自晋汉以来，北敌强盛，盖由中朝无主，至晋帝蒙尘，乃否之极也。今慕化而来，亦由时运，非凉德所至”<sup>②</sup>，也表示了对修好的诚意和欣慰。

开宝八年（975年）三月，辽遣使以书讲和，宋太祖则召契丹使于讲武殿观习射，以示慰问。七月，宋阁门使郝崇使等出使辽，辽则遣使臣向宋赠御衣、玉带、名马。终宋太祖之世，两朝关系呈现转机，友好往来不断，河北暂得安宁。

## 二、以安民务农为中心的经济政策

五代十国时朝代屡易，兵戈不休，黄河流域许多地方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宋始建国，疮痍未平，农业凋敝。为了恢复经济，巩固新建政权，宋太祖一面对四方列国用兵，一面采取各项政策，推行各地，促进生产恢复发展，安定民生。

劝督农桑 为了鼓励人民开荒广种，宋太祖“初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拘，止以见佃为额”<sup>③</sup>。对新开辟的土地州县不检括，不增税，使垦荒者得到实惠。宋廷还选官分赴诸道督查，凡“受民租调，有增羨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弃市”<sup>④</sup>。定法极严。遇到荒年更另行减租。河北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自建隆末至乾德初，北方连年蝗旱，禾稼枯槁，河北尤甚，如建隆三年（962年）春夏，“河北大旱，霸州苗皆焦仆”<sup>⑤</sup>。六月，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二、三。

同上。

《宋史》卷174《食货上二》。

同上。

《宋史》卷63《五行一》。

魏、贝、冀、磁、相、邢、洺州等地少雨，宋廷遣从臣十人检河北诸州旱田，十二月又令免民租。

增加社会劳动力是恢复经济的必要条件。河北自唐末以来，久困兵革，男孤女寡，十室九空，加之自然灾害频仍，有的地方村落皆空。建隆二年（961年）“徙北汉降民于邢州（治今邢台市）、洺州（治今永年县广府镇）”<sup>②</sup>。乾德元年（963年）四月，又有北汉降民迁磁州（治今磁县），分以闲田，并给耕牛及钱米。上述邢州、洺州、磁州直至河南安阳原都是后晋末年辽兵侵扰之地，千里之内，焚剽殆尽，长期以来地广人稀。宋初，人口多次迁徙，其规模不等，如开宝三年（970年）五月，命兵士迁河东（今山西）民万户于太行以东，万户就相当几万人口，规模很大。河北各地外来人口所占比例也因此逐渐增高，如马仁瑀守瀛州，先前各县十室九空，后“半由迁实”，即土著户与外来户各占二分之一。在迁徙的人口中，大量的是由宋兵俘获而来，如镇州兵马铃辖刺史等于乾德元年七月，“率兵入北汉界，获生口数千”<sup>③</sup>。

为了加快人口增长，建隆三年十一月，规定“县令考课以户口增减为黜陟”<sup>④</sup>。这一政策更促进了各地方积极招集流民复业，制止劳动力散失。后周世宗曾以灭佛、禁私度僧尼控制劳动力脱离生产。宋也因袭其法，不准寺观滥度僧人，道士无行者，也令还俗归本。

在农业恢复发展中还加强了林业建设。兵荒之际，林木多被滥砍滥伐，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如辽会同元年（9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十二月》。

《宋史》卷1《太祖一》。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七月》。

《宋史》卷2《太祖二》。

年），辽兵南下，分为三路，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多被夷伐焚荡，“打谷草”家丁随军专伐园林，填塞道路，安营扎寨“唯用桑柘梨栗。军退，纵火焚之”<sup>①</sup>。同年，辽主率兵至邢、洛、磁；见大桑木骂曰：“吾知紫披袄出自汝身，吾岂容汝活耶”，束薪于木而焚之”<sup>②</sup>。这种破坏林木的状况直到951年后周立国时，方有扭转，桑木园林始得复兴。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曾专门颁布植树令，发展农林业。这项法令在宋太祖开国之后进一步推开，《宋史·食货志上》记载：建隆以来，“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植树”，规定凡民籍分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株，每等递减二十，梨枣各半，所在长吏告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只输旧租。为确保造林兑现，州县“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殿最”<sup>③</sup>。对于破坏林木者，则给予严厉惩罚，“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放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sup>④</sup>。这些植树护树的法令，推动了农林及蚕桑业的恢复与发展。

治水直接影响农业的成败。河北处于黄河下游，因水势平缓，泥沙淤积严重，两岸全靠大堤作屏障，一旦决口就造成水害。乾德四年、五年，连岁河决澶州（治今河南省濮阳市），水入大名、沧州，坏民庐舍，田苗荡尽。为及时有效治水，乾德五年（967年）正月，令澶州、大名、沧州、棣州等沿河十七州长吏兼任本州河堤使；开宝五年（972年）三月，又于十七州各置河堤判官一员，这样就形成了地方治水责任制。是年三月，黄河决大名朝城县（今属山东省阳谷县），河南、河北诸州皆发大

《辽史》卷34《兵卫上》。

《契丹国志》卷3《太宗下》。

《宋史》卷173《食货上一》。

同上。

水，调兵士及丁夫五万人堵塞决河，不久，河所决皆塞。这是宋太祖时期实施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治水工程。这次治水成功，显然与实行州县责任制有关。沿河植树也是治水的重要措施。建隆三年（962年）十月，令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年派兵种榆柳以壮堤防。开宝五年（972年）正月，还明确规定，缘黄、汴、清、御河州县，除准旧制种艺桑枣外，委长吏课民别种榆柳及土地所宜林木。仍按户籍高下定为五等，第一等岁植五十本，自第二等，递减十本，民欲广种者听便。沿河造林既能加固河堤，又为修堤治水备足物料。

**薄征赋敛** 五代以来，天下户口、垦田数字记录多不实，国家赋入渐少。为此，宋于建隆二年春正月，命使度田，即检核各地垦田和户口，均定田赋。法令还强调：苛暴失实者辄谴黜。地主隐瞒土地，逃避赋税的现象很严重，他们勾结官吏，上下交弊，极力破坏度田。河北大名府馆陶县民郭贄斗胆状告本地官府量田不均，经宋廷核查，所隐顷亩皆实，宋太祖遂令决杖县令程迪，并流放海岛，检田使常准也被贬黜。一民告倒两个官，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事，足证度田确有实效。这一措施不仅免去了农民部分沉重负担，又使富户不致逃税，大大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

人为的变相增租增赋历代皆有，五代更为突出，往往高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按旧例，每收税毕，州官勒索下级县吏，谓之“会州”。县吏则转嫁于里胥，里胥则重取于民，民甚苦之。宋乾德元年正月，下禁令“无得追县吏‘会州’”<sup>①</sup>。宋初承前代制，调绢、油、布、丝、绵以供军需，各地就本地所产折科和市，而官吏借故征求无度，这显然也是一种变相增赋。开宝三

年，令天下诸州凡丝、绵、油、绢、麻布等物，所在足二年之用，不得广科市以烦民。法令革除了旧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通盐不禁 宋太祖在位十七年，多所作为，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由于河北是天下根本之地，更得到宋太祖的关注。盐，百姓无一日不食，历代国计军需多仰盐课。宋建国，河北地处边陲，与强辽对垒，直接关系赵氏江山的安危。宋太祖以为，河北地多斥卤，且河朔之人，可安不可扰。于是，令通盐不禁，听商人贸易，“官收其算”。这是河北通商制的原因。大体过程是，建隆末，先在邢、洛、磁、镇、冀、赵等州城外 20 里通行商盐，继而才遍行河北。开宝三年四月，“悉除诸州盐禁”，凡大名、真定府、贝、冀、相、卫、邢、洛、深、赵、沧、磁、德、博、滨、棣、祁、保、瀛、莫、雄、霸州、德清、通州、永静、乾宁、定远、保定、广信、永定、安肃军皆许通商盐<sup>①</sup>。宋太祖“罢禁商”，安定河北民心，减轻了人民负担，有利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助于边防的巩固。

## 第二节 宋辽争衡战衅屡开

### 一、辽景宗中兴国力日强

枢前即位 辽自大同元年（947 年）太宗耶律德光占据中原得而复失之后，民力疲敝，元气大伤。同年四月，辽世宗耶律阮即位于镇州（治今正定县），他荒于酒色，诸部屡叛，国不安宁，即位未及三年就被杀身亡。公元 951 年，辽穆宗耶律璟即位，改元应历。辽穆宗号称“睡王”，不恤国事，无文治武功可

<sup>①</sup>《宋史》卷 181 《食货下三》。

言。在对外方面，辽先抗后周，后拒北宋，而结好北汉，双方岁使不绝。辽穆宗的后十年，正当北宋立国之初，辽无力乘宋立足未稳一举南下夺取中原，而只有骚扰性或试探性的军事行动。如辽应历十三年（963年）、十七年宋欲城益津关，辽以兵骚扰。应历十年、十四年、十八年，辽曾出援北汉与宋兵交手，但也不过助人一臂之力而已，表明辽朝民力未苏、国力不足。

在内政方面，辽穆宗唯以酗酒、滥刑、嗜杀为乐，为延年益寿，用男子胆和药，不数年，杀人甚多。刑法极酷，炮烙、铁梳、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脛、划口碎齿等等，暴虐益甚。诸王大臣屡谏不听，谋乱、投敌事件层出不穷。应历十九年二月，终因赏罚无章、朝政不修，嗜杀不已，而“变起肘腋”，被掌膳者持刀杀于黑山之下。辽世宗之子耶律贤及扈从，闻变，夜率飞龙使呢哩、侍中萧思温等甲士千人驰赴黑山定乱，群臣乘势劝进，遂即皇帝位于枢前，是为辽景宗，改元保宁。

景宗中兴 耶律贤二十二岁继帝位，为人性仁懦，好音律、喜医术，耽酒色，而游猎时，体惫竟不能乘马，弱不禁风。因此，“国事皆后决之”。国后即萧绰皇后，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兼习知军政，能驾驭臣工，故多得其死力”<sup>①</sup>。可见，萧太后是有胆识、有治国之才的女性。自萧太后主政以后，辽王朝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农牧业的措施，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辽保宁七年（975年）辽国已能应北汉之请，以粟20万斛助北汉。辽圣宗乾亨五年（983年），诏“五稼不登，开帑藏而代民税；螟蝗为灾，罢徭役以恤民贫”<sup>②</sup>。这些法令说明，辽朝农业有很大的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代税、免

① 《辽史纪事本末》卷20《承天太后摄政》。

② 《辽史》卷59《食货上》。

役，有助于国家安定，同时也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防止灾民流于道，稳定农业劳动力。牧业是辽西部、北部的首要产业，在广大游牧区，辽大力发展畜牧业，特别是牧马蓄息，大量扩充军马。经休养生息，辽朝国力日强、兵威日振。

## 二、宋太宗二取幽燕北伐失败

一取幽燕 宋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在统一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宋太祖赵匡胤病死于万岁殿，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宋太宗“既然有削平天下之志”，首先把统一斗争的矛头指向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宋太宗对中外告以北伐，将亲征太原灭北汉。同时，命云州观察使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以断燕蓟援师。宋大事调兵遣将惊动了北面邻邦，辽国特遣塔玛长寿使宋，“问兴师之故”，宋答以“河东逆命，所当问罪”，并警告辽：“若北朝不援，和好如故，不然则战”<sup>①</sup>。辽非孱弱小国，毫不示弱。三月，辽数万兵将攻宋河东石岭关（太原城东北）及河北关南以助北汉，宋辽和好由此中绝。五月，北汉主刘继元抵不住宋攻击，终于降宋，河东平。

宋太宗雄心勃勃，平太原之后，以辽援北汉为由，欲领师乘胜，北伐夺取幽燕，建不世之功。但是，士气不盛、君臣分歧两个不利因素为宋太宗所忽视。由于太原之战馈饷已尽，士兵疲乏，再加上将帅不满朝廷不赏太原之功，反而连续作战出师北伐，故诸将皆不愿行。群臣中，支持北伐者如参政知事赵昌言说：“自此取幽州，犹热鏊翻饼”，意即武功易成。反对者如殿前都指挥使呼延赞说：“书生之言，不足尽信，此饼难翻！”<sup>②</sup>

<sup>①</sup>《辽史纪事本末》卷19《宋初和战》。

<sup>②</sup>王得臣：《麈史》。

这时，宋太宗对不同意见已难入耳，当殿前都虞崔翰乘机上言：就此破竹之势，取幽燕是甚易之时，太宗闻后大喜，即命枢密使曹彬调发屯兵出征北伐。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六月，宋调发河北、京东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进入辽境后，募民百人为向导，战事极为顺利，辽东易州（治今易县）刺史刘宇、涿州（治今涿州市）判官刘厚德先后以城降宋，辽南京（即燕京城）已暴露在宋军面前。宋太宗驻蹕于城南宝光寺，并疾速率众击溃驻扎城北的辽军，遂命节度使宋偓、崔彦进、刘遇、孟玄喆四面分兵攻城。辽兵、辽将在此期间继续有投宋者，如知顺州（治今北京市顺义县）刘廷素、知蓟州（治今天津市蓟县）刘宋恩等。当地汉人也常以牛酒犒劳宋师。宋太宗面临有利形势，求胜心切，亲自“乘辇督攻”，收取幽州之日似乎屈指可数。但是，连续十二天攻城不下，卒疲食尽，宋军士气已处于衰竭状态，军营中渐渐传播着战则必败的情绪。一兵士掘战壕得一蟹，有人言：“蟹者，解也，其班师乎？”于是兵士纷纷盼望撤军。又一夕“角声送风至帐”人又言“寇至之兆也”<sup>①</sup>，真是风声鹤唳，自相惊扰。

日夜坚守南京城的辽将耶律学古全力备御，但被围日久也渐渐不支，城中人怀二心，形势危机。辽景宗紧急召见耶律沙、奚底、讨古等至军中议事，制定救燕之计。秋七月癸未日，耶律沙率兵主动出击，与宋兵在高梁河遭遇（高梁河源出玉泉山，流注蓟城西北），两军大战。初战，辽兵败，将要逃遁之时，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率援军及时赶到，分左右翼横击，宋兵大败，被追杀三十余里，弃甲抛矛而逃，“死者万余人”<sup>②</sup>。固守幽州的

王偁：《东都事略》，《辽史纪事本末》卷 19 《宋初和战》。

《辽史》卷 83 《耶律学古传》。

耶律学古闻援兵已至，开门列阵，呼声震天，勇猛冲杀，宋军大败，幽州解围。惊恐的宋太宗与亲厚夜遁至涿州，太宗只得窃乘驴车逃跑，“仅以身免”。凡行在服御、宝器、从人宫嫔皆陷没，辽“所获兵仗、粮饷不可胜计”<sup>①</sup>。高粱河大战是战局的转折点，辽转劣势为优势，宋太宗一取幽州以失败告终。此后，宋太宗只好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彦进屯关南，刘廷翰、李汉琼屯镇州（治今正定县），以守待攻。

报围燕之仇 宋太宗从兵败中未能吸取深刻教训，回到京师怒气不解，对诸将太原之功仍不欣赏，并接连贬谪了参与北伐的几位将帅。例如，中书令石守信，因“督前失律”，降职，责授崇信节度使兼中书令；刘遇责授宿州观察使；光州刺史史珪责授武定军司马等，皆因“所部兵逗挠失律故”<sup>②</sup>。

辽与宋形成鲜明对比，大行献俘、奖赏之礼，庆典胜利。耶律学古以能安人心、捍城池“诏褒奖”，其他将士分别爵赏。辽不以胜为满，还要报围燕之仇，以泄其愤。乾亨元年（979年）九月，命燕王韩匡嗣等攻宋镇州（治今正定县），十月，军至满城西。但由于求胜心切而轻敌妄为，宋兵以诈降疑敌，韩匡嗣信以为真，而耶律休哥见宋军士气甚锐，断定是疑诱之计，主张整兵待敌，而韩匡嗣不听，以致麻痹松懈。宋乘机将御赐八阵图改为二阵，“合而击之”，三战而使辽军大溃。宋“追至遂城（今徐水县西）西，大败之，斩首万级，获三将，马万匹”<sup>③</sup>。韩匡嗣弃旗鼓逃走，耶律休哥也只好随之而退。

满城一仗不论谁胜谁负都无关全局，但对宋辽矛盾却起到

① 《辽史纪事本末》卷 9 《宋初和战》。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2 《太平兴国六年八月》。

③ 《宋史纪事本末》卷 13 《契丹和战》、《宋朝事实类苑》卷 56 《将帅才略》。